

载陈章太等主编《语言规划的理论和实践》，
语文出版社，2006，第55-60页。

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

—从定义变迁看学科发展

刘海涛

中国传媒大学应用语言学系

摘要：本文从1959-2005年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文献中提取了30余种有关“语言规划”的定义，并对这些定义进行了简要的分析。通过观察这些定义的变迁，作者认为可将语言规划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主要对比特征有：工具——资源，结构主义——后现代，单变量——多变量，语言学——多学科，实用——人权等。

关键词：语言规划 语言政策 语言生态 语言多样性

人类有意识影响语言发展的活动由来已久，今天人们一般用“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来特指这个领域，如现在至少有两个刊名中含有“语言规划”字样的国际性学术刊物：“Language Problems and Language Planning (语言问题和语言规划, John Benjamins, 1977-)”和“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语言规划的当前问题,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0-)。至于“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虽然有学者认为二者是有区别的，如Ager¹用“语言规划”表示那些由个人或集体从事的非官方的活动，用“语言政策”特指官方的行为。但本领域的大多数文献对二者没有做详细的区分。为此本文在引用时基本按照原作者的用法直接引用，对二者也不做进一步的区分。

一般认为，术语“语言规划”首次出现于1959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在现代挪威规划一种标准语言”²的文章里，文章作者为Einar Haugen。而Haugen自己则说Uriel Weinreich曾在1957年的一次研讨会上使用过这一术语³。不管是那一种说法，‘语言规划’这一术语的首次出现时间大致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这一点大致是可以肯定的。

Haugen在1959年的文章中，将“语言规划”定义为：“一种准备规范的

¹ Dennis Ager (2001) Motivation in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policy.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² “Planning for a standard language in Modern Norway”,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1: 3 (1959), p. 8-21.

³ “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in language planning: Ivar Aasen’s grammar”, Word, 21(2):188-207.

正字法、语法和词典的活动，旨在指导非同质言语社区中的书面和口头语言应用”。后来在一篇题为“语言学和语言规划”的文章中，Haugen 对此做了补充，他说“现在我宁愿将其（即：他 1959 年的定义—刘注）视为语言规划的一个结果，它是实现语言规划工作者所做决策的一部分。语言规划的核心是‘用选择的方式，对现有的语言形式进行判断的活动。’简言之，可将语言规划定义为对语言变化的评价。”⁴Haugen 认为语言规划是社会规划中的一个部分，据此他也有过一个更具一般意义的语言规划定义“为一个言语社区，建立目标、政策和过程的活动。”⁵ Haugen 这些对语言规划的定义，看似不同，实际上，却从不同的角度道出了语言规划的许多本质属性。这一点，我们会在下面的分析过程中，看的更清楚。现在，我们开始语言规划的定义之旅⁶。

Tauli(1968): 语言规划是调节和改善现有语言，或创造新的区域性、全国性和国际性语言的活动。语言规划涉及语言的口头和书面形式的各个层面：语音、词法、句法、词汇和正字法。语言规划理论是系统研究语言规划的目标、原则、方法和策略的学科。⁷

Rubin & Jerrudd(1971): 语言规划是一种有意识的语言改变，即：对语言系统本身或语言应用，以及对二者的改变。这些规划是由专门为此目的而建立或得到授权的机构来进行的。语言规划的主要任务是解决问题，它的特点是通过制定和评价各种解决语言问题的方法，以寻求最好（或最优，最有效）的决策。

Thorburn(1971): 如果人们试图通过各种语言知识来改变一组人的语言行为时，就出现了（语言规划）。

Jernudd & Das Gupta(1971): 我们认为规划不是一种理想主义和完全属于语言学的活动，而是一种为了解决社会语言问题的政治和管理活动。

Gorman(1973): 在我看来，术语‘语言规划’最适于说明这样一些有组织的活动，即对语言的正字法、语法、词汇以及语义方面进行选择、规范和加工。

Das Gupta(1973): 语言规划是指一组有意识的活动，这些经过系统设计的活动在一定的时间里组织和发展了社区的语言资源。

Fishman(1974): 术语‘语言规划’指的是对语言问题解决方法有组织的寻求，一般出现在国家一级。

Karam(1974): 本术语指的是一种试图解决语言问题的活动，通常由国家来进行，其对象为语言本身或语言应用，或二者兼而有之。

Weinstein(1980): 为了解决交际问题，而在政府授权下所进行的长期的、

⁴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planning’, in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161.

⁵ ‘Language plan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p. 287.

⁶ 所有定义尽可能从原文献引用。没有特别注明的几个定义均转引自 Robert Cooper (1989): *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除个别无法找到原文的定义外，以下所列定义的汉译文，均由作者自译。每一个引用的定义，包括：作者名，时间和定义。

⁷ Tauli, V. 1968. *Introduction to a theory of language planning*. Uppsala. p. 27.

连续的有意识改变语言本体或改变语言社会功能的努力。

Neustupný(1983): 语言规划指对于语言问题系统的、基于理论的、理性的和有组织的社会关注。

Eastman(1983): 为了达到某些规划机构设定的目标, 而将语言作为一种社会资源进行操作的活动。规划机构一般指当地的政府、教育、经济或语言权威部门⁸。

Christian(1988): 语言规划是一种旨在解决语言问题的公共和系统的努力, 它通过机构组织对语言使用的干预来达到相应的目标⁹。

Cooper(1989): 语言规划指的是有意识去影响他人语言行为的努力, 包括习得、结构和功能分配等方面。

Halliday(1990): 语言规划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活动, 它含有两种完全不同, 而且本质上有冲突的成分: 其一是有关‘意义’的, 这与我们有关语言和符号学的所有其它活动是相同的; 其二是关于‘设计’的。如果我们从更广的角度来看设计系统和进化系统的区别, 那么语言规划意味着在一个自然发展的系统(即语言)中引入设计过程和设计特征。语言规划活动的重点在制度, 而非本体, 也就是说, 它规划的不是语言的形式, 而是语言与其使用者之间的关系¹⁰。

Jernudd(1991): 语言规划是前瞻性的、有组织的语言管理, 一般(但不一定)是由政府授权和资助的公共机关进行的。语言规划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它为寻求最佳决策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可在未来实现其理想的框架¹¹。

Tollefson(1991): 语言规划是所有有意识地影响语言变体的结构或功能的活动。语言政策是由政府所从事的语言规划¹²。

Bugarski(1992): 简言之, 术语**语言政策**指的就是一个社会在语言交际领域的政策, 这些地位、原则和决定反映了社区与其可操用语言、交际潜力的关系。**语言规划**一般被认为是在语言政策框架内所采取的一系列作用于社区语言交际上的具体措施, 这些措施常用来指导语言的发展¹³。

胡壮麟(1993)认为:(1)语言规划是有意识的、有组织的活动。(2)它涉及私人 and 官方的努力。(3)语言规划旨在发现和解决交际问题, 这些问题既有语言学的, 也有非语言学的。(4)语言规划要解决的是全国性问题, 故需较长时间评估并在一定社会中解决这些问题。(5)语言规划要有一定的理论框架

⁸ 转引自 Nanette Gottlieb & Ping Chen (eds, 2001):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Policy. East Asian Perspectives*. Richmond: Curzon Press. p. 23.

⁹ 转引自 Tessa Carroll.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Change in Japan*. Richmond: Curzon Press, 2001. p. 11.

¹⁰ M.A.K. Halliday (1990): *New Ways of Meaning: the challenge to applied linguistics*. In: Alwin Fill/ Peter Mühlhäusler(eds.): *The Ecolinguistics reader*. Continuum. 2001. p.177.

¹¹ Björn Jernudd (1991): *Lectures on language problems*. Bahri Publications.

¹² James Tollefson (1991): *Planning language, planning inequality*. Longman. p. 16.

¹³ 转引自 Schiffman, H. F. (1998). *Linguistic Culture and Language Policy*. London: Routledge.

指导¹⁴。

Gottlieb(1994): 语言规划是有意识的工程化的语言改变。语言政策是规划者为了达到预定目标而制定并实施的特定策略¹⁵。

Mackey(1991): 语言规划是对语言多样性的社会调节¹⁶。

Kaplan & Baldauf Jr. (1997): 语言规划是某些人由于某种理由试图改变某个社区语言行为的活动¹⁷。

Tonkin (1999): 语言规划是一种对语言选择过程进行的有意识干预，旨在影响相关的选择¹⁸。

Grin(1999): 解决语言问题是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首要目标。所有“语言问题”的共同核心是**多样性**，因此语言政策的根本使命是**多样性的管理**¹⁹。

冯志伟(1999): 语言规划就是政府或社会团体为了解决语言交际中出现的问题有计划有组织地对语言文字进行的各种工作和活动的统称。它是语言政策的具体体现。...语言规划具有社会性、交际目的性、长期性、庞杂性和权威性的特点²⁰。

许嘉璐(1999): 语言规划是国家或社会团体为了对语言进行管理而进行的各种的统称。所谓规划或管理，是个广义的概念，包括语言的选择和规范化、文字的创制和改革等方面的具体问题²¹。

Gottlieb & Chen(2001): 语言规划是有意识去指导、改变或保留一个社会语言代码的习得、结构或功能分配的努力。语言政策指的是由权威机构来进行的这些活动的系统性规划²²。

Lo Bianco(2001): 一种最直接地将语言变为公共政策的学术领域，这就是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²³。

Phillipson(2003): 语言政策是社会政策的集成部分。地位规划、本体规划以及获得规划²⁴是语言规划的主要内容，作为语言社会学的一个分支，语言规

¹⁴ 胡壮麟, 1993, 语言规划, 《语言文字应用》, 1993.2.

¹⁵ 转引自 Carroll(2001):12.

¹⁶ 转引自 Carroll(2001):12.

¹⁷ Kaplan, Robert B., & Baldauf, Richard B. (1997): *Language planning from practice to theory*.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p 3.

¹⁸ Humphrey Tonkin (1999) *Kio estas lingvoplanado?* en D. Blanke, R. McCoy, O. Buller (red.): *Por Aktiva Lingvopolitiko*. Rotterdam: UEA. p. 9-14.

¹⁹ François Grin (1999) "Language Planning as Diversity Management: Some Analytical Principles". *Plurilingua*, 21: 141-156.

²⁰ 《应用语言学综论》，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p. 91.

²¹ 《语言文字学及其应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p. 156.

²² Nanette Gottlieb & Ping Chen (eds, 2001). p. 4.

²³ Joseph Lo Bianco (2001) *Officialising Language: A discourse study of language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PhD thesis,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²⁴ 所谓‘获得规划’一般是指通过有组织的活动来推广一种语言的学习。—刘注

划与经济学、人口学、教育学和语言学有关²⁵。

Mühlhäusler(2003)认为：按照生态学的观点，语言规划已不再是一种流水线式的作业过程，而是一种旨在保持人类交际系统最大多样性的活动²⁶。按照他的说法采用生态观的语言规划者追求的解（语言的多样性）正是传统语言规划者们要解决的问题²⁷。

Baldauf(2004)：语言规划是一种有意识的、面向未来的对语言代码及语言使用的系统改变，一般由政府来进行。语言规划可分为以下四类：地位规划，本体规划，教育规划和声望规划²⁸。

Spolsky（2004）认为有必要把一个言语社区的语言政策分为三个组成部分：语言实践—使用者在自己可操用语言变体中进行选择的惯用模式；语言信念或意识—关于语言和语言使用的信念；以及通过任何语言干预、规划或管理的方法来修改和影响这种语言实践的所有努力²⁹。

陈章太（2005）：政府或社会团体为了解决语言在社会交际中出现的问题，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语言文字及其使用进行干预于管理，使语言文字更好地为社会服务³⁰。

Cooper 提出过一个语言规划行为的分析模式³¹。他认为可以从以下八个方面去分析语言规划活动：谁是规划的制订者？针对什么行为，针对哪些人？要达到什么目的（或出于什么动机）？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通过什么决策过程？效果如何？显然这八要素是针对语言规划行为本身的一种分析。有学者认为要理解语言规划的总体影响不能仅考虑这些关系，而且也应该考虑这样一些因素：谁接受规划规定？接受什么规划规定？从哪儿接受规划规定？在什么情况下接受规划规定³²？这是从语言规划的受众角度来分析问题的。

现在是回到定义本身的时候了，从跨越 45 年的三十多种定义中，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语言规划具有这样一些特征：语言规划是人类有意识的对语言发展的干预，是影响他人语言行为的一种活动；语言规划是为了解决语言问题的，所谓语言问题是由语言的多样性引起的交流问题；语言规划一般是由国家授权的机构进行的一种有组织的活动；语言规划不仅仅对语言本体进行规划，更多

²⁵ R. Phillipson 2003. *English-Only Europe? Challenging Language Policy*.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p. 15.

²⁶ Peter Mühlhäusler(2003) *Language of Environment-Environment of Language: A course in Ecolinguistics*. London: Battlebridge. p. 35.

²⁷ Peter Mühlhäusler(2000)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Ecology*. In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1(3): 310.

²⁸ Richard B. Baldauf Jr (2004) *Language Planning*. in Philipp Strazny (ed. 2004) *Encyclopedia of Linguistics*, Routledge.

²⁹ Bernard Spolsky (2004) *Language Poli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5.

³⁰ 陈章太(2005)《语言规划研究》，商务印书馆。第 2 页。

³¹ Cooper 1989: 98.

³² Haarmann (1990) “从语言的总体理论看语言规划：方法论框架”，汉语译文，载周庆生主编《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2001，语文出版社

的是对语言应用的规划，对语言和人以及社会之间关系的规划；语言规划是一种立足现在，面向未来的活动；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是国家或地区社会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语言规划与语言学其它领域的不同在于，它通过明显的、有组织的人工干预在自然语言中引入“人造”成分。这基本上是 1980 年代中后期之前人们对于语言规划的一些看法。1990 年代以来，人们对语言规划又有了更多的认识：语言规划是对语言多样性的一种人工调节；语言规划不是要消灭语言的多样性，而是要保护这种多样性；语言规划的目的不再只是解决交际问题了，而且也应该考虑其它非交际的问题；语言规划也应该考虑受众的感受，考虑规划行为对整体语言生态系统的影响；语言规划不仅仅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也和社会学、政治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语言规划应该被视为社会规划的一部分。

Ricento 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研究分为如下三个阶段³³：

阶段	内容	宏观—社会政治	方法论	策略
早期工作（1950—1960 晚期）	脱离殖民、建立新的国家		社会科学中的结构主义	语言问题可以通过规划来解决
第二阶段（1970 早期—1980 晚期）	现代化失败		社会语言学批判理论	现实主义
第三阶段（1980 中期—现在）	世界新秩序		后现代主义	语言人权

我们认为 Ricento 讲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分为三个时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从定义变迁的角度来看，我们更有理由将语言规划的发展时期分成两个大的阶段。1950 年代至 1980 年代中后期为第一阶段，1980 年代中后期至今为一个阶段。这样的划分依据要更充分一些，因为 Ricento 所说的第二阶段的转换特征并不明显，严格说来是可以将其归结到第三阶段里的。

第一阶段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目标基本上与那些新创建的国家的整体目标密切相关的，即：国家的统一和‘现代化’，而这一过程中被仿效的对象大多是具有“一种语言、一种文化、一方领土、一种政治概念”传统的西方国家。按照苏金智（2004）的统计，在 186 个国家和地区中，有 112 个国家和地区用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了自己国家的国语或官方语言³⁴。这一时期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在不经意间，都会流露出多语现象是混乱、贫困和落后的意象，而能够有一种标准语才是发达国家的表征。这样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目标就成了消除由于语言的多样性所带来的语言交际问题了。显然，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多元化基本就成了无人顾及的弃儿。

³³ Thomas Ricento (2000)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4(2). p.196-213.

³⁴ “论语言多样性背景下国际间的语言平等”，载《国际关系中的语言问题》（刘海涛主编），国际世界语协会出版，2004。

但是,模仿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社会政策的制定及效果与国情的方方面面有着密切的联系,世上没有灵丹妙药。语言政策作为社会政策的一部分也不例外。希冀中的“经济腾飞”和“社会发展”,并没有到来。这个时候,人们开始反思,开始用批判的眼光来审视过去的做法。这种对社会政策的反思,也影响到语言政策领域。语言规划开始从单一的以语言代码为中心的理论过渡到综合考虑语言应用和各种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关联问题了。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对象也从过去的‘语言’变为‘语言社区’。对传统的批判和反思成了推动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向第二阶段转移的动力。

Mufwene 在一篇有关语言生态学的论文中的第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毫无疑问,1990年代将被铭记在语言学史上,这是一个语言学家对语言的濒危和消失问题日益重视的时期。”³⁵ 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中,这种对语言多样性的重视可以视为一种后现代主义在语言学中反映³⁶。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如:反基础性,提倡多元性;反原子性,提倡整体性;反确定性,倡导非确定性;反对霸权,寻求和谐共存;反简单性,拥护复杂性,倡导生态观。所有这些开始渗透到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这种思潮也影响到语言学,影响到社会语言学,当然也会影响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领域。这也就是 Ricento 所说的,在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大背景下,在“后现代主义”的旗帜下,通过“语言人权”这张牌来进行语言规划的缘由。对于这一点,我们是赞同的。

按照 Kymlicke/Grin(2003) 的说法,目前人们在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名称下,讨论的大多还是属于“语言政治”(politics)层面的东西,而不是“政策”(policy)。因为,政策关心的是怎么实现某个目标,而政治的中心才是选择目标的过程³⁷。对于这种语言规划中的“政治中心论”,第一本语言规划理论著作 (Tauli 1968) 的作者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批评,他说“然而,目的论要重于社会学..... 语言规划的目标应该是尽可能使得语言成为一种更有效的工具。... 我们应该使语言更适宜于现代文化和现代社会。”³⁸ 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语言不仅仅是交际的工具,它也是文化的容器和身份的象征。语言的这三种功能要求不同的政策来保证,这就使得语言政策的制定者在制定语言政策时,不得不均衡考虑各个因素间的相互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语言政策的重点也会有不同。对于一个刚成(独)立的国家,语言的交际功能和象征功能就要强于文化功能,而在一定时间之后,为了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国家内部各民族的均

³⁵ Mufwene, Salikoko S. (1998):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New Imperatives in Linguistics Curricul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ymposium on The Linguistic Sciences in a Changing Context,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 30-31 October 1998.

³⁶ 刘海涛 (2003) 后现代主义和语言学 (研究备忘录), BBI。

³⁷ Will Kymlicka, François Grin (2003) Assessing the Politics of Diversity in Transition Countries. In: Nation-building, Ethnicity and Language Politics in Transition Countries. Open Society Institute. p. 5-27.

³⁸ Tauli, Valter (1984): "The failure of language planning research." In: Gonzalez, Andrew FSC (Red.): Panagani: Essays in honor of bonifacio P. Sibayan on his sixty-seventh birthday. Manila: Linguistic Society of the Philippines, p. 85-92.

衡发展就显出其重要性了。我们可以将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中的这种转变视为社会变化之一种，语言政策是社会政策的组成部分，社会发展各个时期重点的不同也要求不同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来适应。早期语言规划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语言交际问题的，这一点从刚才提及的一些定义中不难看出，杂志“语言问题和语言规划”（LPLP）（1977-）的名字更是道出了语言规划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语言问题的真谛。当人们过分强调某种语言的交际功能，并用政策来大力强化这种功能的时候，难免会弱化其它语言的交际功能和文化功能，这是一个摆在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制定者面前的不应回避的问题。Weinstock 举了一个令人深思的例子³⁹：某人有一件珍贵的木雕艺术品，价值不菲，显然这种价值指的是内在价值或文化价值。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只有将这件木雕烧掉才能保命的时候，该选择木雕的实用（工具）价值还是内在价值？Weinstock 认为语言有内在价值，也有工具价值，二者的高低既不能一概而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应视具体的环境而定。我们认为对弱势语言不仅仅应该保护它的内在价值，而忽视其工具价值，因为不能交际的语言实际上已经丧失了语言最根本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也很难去保护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就强势语言而言，不能仅仅认为它只有工具价值，而忽视它的文化价值。对于强势语言内在价值的忽视，会导致它对其它文化的侵蚀。所有这些说明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不再是一个单变量的过程了，而是一个与具体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的多变量过程，并且导致语言变量改变的因素很可能来自非语言变量。计划语言的实践证明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非语言变量的作用往往大于语言变量⁴⁰。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研究者们应该寻求非语言变量和语言变量之间的这种关系，力求语言系统的平稳运行，在可能的情况下，要充分挖掘语言的自我调节和发展能力。Haarman(1990)列出了影响一个集体进行群内和群外交际的生态变量，共分为7大类35小类⁴¹。Kaplan/Baldauf(1997)较系统的建立了一种语言规划的生态观，并在他们编辑的几本著作（1999，2000）中采用这种方法分析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语言生态状况⁴²。语言规划的生态观也在由Kaplan、Baldauf主编的“语言规划的当前问题”（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2000-）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还记得另一本含有语言规划字样的学术刊物吗？这两种刊物的名字，差不多就是我们所说的语言规划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的极好佐证。

³⁹ Daniel Weinstock (2003): The Antinomy of Language Policy. In W. Kymlicka/ A. Patten (eds.): Language Rights and Political 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⁴⁰ Blanke, Detlev (2001): Vom Entwurf zur Sprache. En: Schubert (2001, Ed.): Planned Languages: From Concept to Reality. Interface. Brüssel: Hogeschool voor Wetenschap en Kunst. p. 37-89

⁴¹ Haarmann (1990) “从语言的总体理论看语言规划：方法论框架”，汉语译文，载周庆生主编《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2001，语文出版社。

⁴² Kaplan, R. B., & Baldauf, R. B. (1997). Language planning from practice to theory.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1999): Language planning in Malawi, Mozambique and the Philippines. (2000): Language Planning in Nepal, Taiwan and Sweden. (2003) Language and Language-in-Education Planning in the Pacific Basin. (2004) Language Planning and Policy in Africa: Volume I: Botswana, Malawi, Mozambique and South Africa. (2005) Language Planning and Policy: Europe: Vol. I: Hungary, Finland and Sweden.

在此，我们列出显现语言规划领域这种转变的一些具体特征：**从工具观到资源观的转变；从结构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变；从单变量系统到多变量系统的转变；从实用主义到语言人权的转变；从语言问题到语言生态的转变；从单纯的语言学领域向社会学、政治学以及其它学科的转变。**

如果语言只是一种工具，那么人们只需追求工具的实用性、易用性、高效性就行了。而作为资源的语言，在人们眼里就有了更多的含义，为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任何资源，特别是难以再生的资源的利用和保护就显得格外重要了。语言的资源观也会使人们从更广泛的背景去处理语言和生态的关系。正如 Nettle 所言“不同的生态模式青睐不同的社会网络，后者又造就了不同的语言群体。”⁴³

总之，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虽然也是社会政策和社会规划的一部分，但“将语言作为对象的政策和规划要比针对其它问题的政策要复杂的多。”⁴⁴ 这也可能就是 Cooper 会用这样一句话来结束自己有关语言规划专著的原因：“规划语言就是规划社会。因此，只有一个好的社会变革理论才会有一个好的语言规划理论。”⁴⁵

⁴³ Daniel Nettle (1999) *Linguistic Divers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79.

⁴⁴ Joseph Lo Bianco (2001) *Real World Language Politics and Policy*. in Steven J. Baker (ed.) *Language Policy: Lessons from Global Models Proceedings from Language Policy Conference held at the Monterey Institute in September 2001*. p. 9.

⁴⁵ Cooper(1989): 182.